

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

● 劉 宏

從二戰結束後到今天，在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佔主導的理論思潮所關注的根本問題，始終是華人如何在「僑居國」落地生根建立起新的、以民族國家為對象的政治效忠和文化認同。隨着「跨國華人」的崛起及其角色日益重要，這些以民族國家為依託的理論似乎力不從心。

自從十九世紀末「華僑」一詞正式出現以來，幾乎所有有關「海外華人」問題的研究都與民族國家以及領土性或地域性 (territoriality) 密不可分。最近二三十年來，中國以及海外學術界所爭論不休的稱謂問題 (華僑、華人、華裔、美籍華人、華裔美國人等等)，實質上都是反映了這種民族國家視野和框架下的一種定向思維，其所強調的是華人與政治上的國家疆界之間的不可分割性。與此同時，從二戰結束後到今天，在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中先後佔主導地位的幾種理論思潮——從「中國文化持續論」、「華人同化論」、「融合論」、「認同論」到強調本土文化的脈絡^①——其所關注的根本問題始終是華人如何在「僑居國」落地生根，建立起新的、以民族國家為對象的政治效忠和文化認同。

儘管這些辯論對於解讀二十世紀大半時期的海外華人歷史與演變有着積極的貢獻，在新世紀的門檻裏，在全球化方興未艾的今天，這些概念與理論是否能夠有效而全面地闡釋當前

海外華人社會的變遷及其前景？筆者認為，隨着「跨國華人」(Transnational Chinese) 的迅速崛起及其在中國以及全球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這些以民族國家和固定不變的地理 (fixed geography) 為依託的理論似乎已力不從心。我們需要新的理論、視野、方法和概念來解釋新的現象，並重新審視舊的問題。這些理論不僅必須切實地把握當今及未來海外華人社會中不斷發展變化的大趨勢，也必須同全球性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動態接軌，並將海外華人的經歷置放於比較的框架下加以思考與分析。

本文並非全面地闡釋有關跨國華人的理論與實踐，而是試圖以這一概念作為討論的出發點，結合當今社會科學界的若干理論思潮以及一些初步的實證資料，來分析跨國華人的構成、產生的背景及其特徵。正如任何雛形的觀念一樣，本文的論點肯定存在着不成熟之處。但是，如果它們能夠在某些方面引起海外華人以及移民問題研究者的關注和反思的話，那

麼，本文也就達到了拋磚引玉的初衷。

一 跨國華人的類型與構成

毋庸置疑，海外華人的歷史從產生開始就是一種跨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然而，由於華人大規模移居海外（尤其是東南亞）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現象，並在二十世紀初達到了頂峰，而這一時期也正好是亞洲眾多國家（包括中國和東南亞）民族主義崛起與高漲的年代^②，這就使華人問題逐漸被置於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下加以考察。到了二戰結束之後，新興民族國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使其境內的少數族群（尤其是華人）在政治上效忠於居住國。這也直接地導致直到1990年代為止將海外華人當作一種政治和安全「問題」加以研究的主流，這一「問題」也被視為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重要因素。換言之，海外華人成為民族國家（無論是東南亞政府還是中國）試圖透過立法與政策，在領土範圍之內加以界定和限定的一種「範疇」；他們的活動領域也隨之被固定於某些特定的政治實體和框架之中。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那些居住於境外、仍然持有中國護照者被稱為「華僑」，而那些已加入當地國籍者則被視為「華人」。在大陸，無論是政府還是學術界，「華僑華人」取代了過去通用的「華僑」，其本質仍然是一致的——民族國家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80年代之後，海外華人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個我稱為「跨國華人」的群體迅速崛起，並成為海外華人中日益起重要作用的一種力量。

那麼，「跨國華人」指的是誰？與其先輩及同時代的其他華人群體相比較，他們有何特殊之處？抽象地說，如果借用「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理論來說明的話^③，跨國華人指的是那些在跨國活動的進程中，將其移居地同（自己的或父輩的）出生地聯繫起來，並維繫起多重關係的移民群體。他們的社會場景 (social field) 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線為特徵。作為跨國移民 (Transmigrants)，他們講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在兩個或更多的國家擁有親屬、社會網絡和事業；持續的與經常性的跨界交往成為他們謀生的重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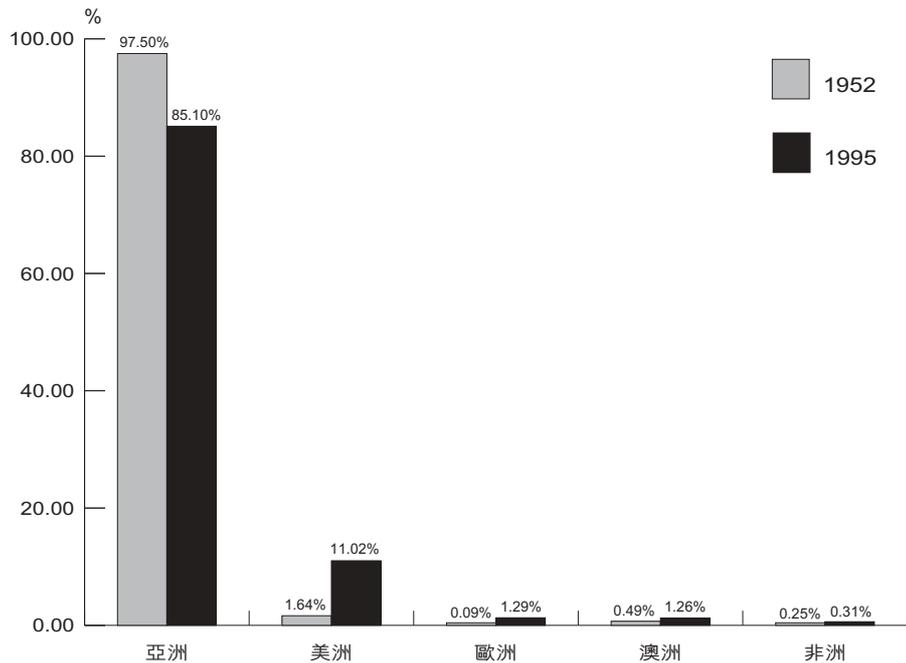
跨國主義與跨國移民的理論產生於二十世紀90年代初期，以上抽象概述的實證基礎主要是居住於美國的拉丁美洲（如波多黎各和海地）的移民群體；現有的學術研究尚缺乏專門以當代跨國華人為個案的研究^④。因此，如何在注重華人國際移民的特殊性的基礎上，將其置於新的理論語境下加以討論，是學術界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事實上，華人移民與拉美移民相比，其歷史更悠長，範圍更龐大，而宗族、地緣和方言的網絡也更為普遍與持久。

具體而言，近二三十年來形成的跨國華人群體包括兩大類：以海外為出發點和軸心的同心圓以及以大陸為出發點和軸心的同心圓；兩者互為補充，構成全球華人社會中的重要新興力量。

首先，以大陸以外為軸心的輻射圈。他們又可分為兩類：以海外為主要活動場景和以中國為主要活動場景。前者包括戰後以來一直存在的「再移民」現象——從傳統的華人移居地（東南亞）遷至北美、澳洲和歐洲等發

二十世紀80年代之後，海外華人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跨國華人」群體正在迅速崛起。他們在跨國活動中將其移居地同（自己的或父輩的）出生地聯繫起來，他們講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在兩個或更多的國家擁有親屬、社會網絡和事業；持續的與經常性的跨界交往成為他們謀生的重要手段。

表1 海外華人的分布 (1952年與1995年)



資料來源：Dudley Poston, Jr., Michael Xinxiang Mao, Mei-yu Yu,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3 (1994): 631-45；駱奇、曾建豐：《海外華人與福建的經濟發展》(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報告第23號，2000)。

從傳統的華人移居地(東南亞)遷至北美、澳洲和歐洲等發達國家的再移民現象，導致海外華人人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變化。這些再移民有相當一部分具備「可攜帶技能」，即受西方教育、通英語、其所從事的職業(如電腦工程師、會計、公司管理層、大學教師等)具有在全球範圍內移動的可能性。

達國家(其人數超過二百萬)。這種再移民現象以及後面將要涉及的新移民的產生，導致海外華人人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變化(見表1)。再移民也改變了華人在移居國內部的比重分配。例如，直到90年代為止，澳洲華人中佔最多數的是來自印度支那和新馬的華人再移民。與此同時，在1950-80年代之間，由於內外因素的交織，源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微乎其微，而香港和台灣則構成了新的華人移居起源地。他們也同樣以西方國家為移民的首選對象。

必須強調，這些再移民與他們的第一移居地(東南亞/港台)仍然保留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謂「太空人」、「內在美」和「傘兵」現象實際上反映了華人跨國家庭的新模式與新活力^⑤。另一方面，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具

備了王賡武教授所稱的「可攜帶技能」(portable skills)——受西方教育、通英語、其所從事的職業(如電腦工程師、會計、公司管理層、大學教師等)具有在全球範圍內移動的可能性。近年來大量港台移民由北美、澳洲回歸的現象則反映了這類移民的跨國流動性。

居住在中國以外的第二種跨國華人與前者不同，他們不是遷往離中國越來越遠的地方，而是同中國——無論是作為實體還是想像的故國——建立起多重的聯繫。他們主要包括那些在中國有着各類的經貿或社會文化事業的群體。他們在其居住地(如東南亞)已經紮根，但近二十年來其生計已經很大部分地與中國聯繫在一起。據估計，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70%以上的外資來自港台以及海外(特

別是東南亞)華人。另一方面，通過海外及港台的藝人和大眾傳媒的中介，一些中國主要城市及沿海區域逐漸出現所謂「唐人街化」的現象，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消費者隨之「跟着感覺走」^⑥。

第二大類型的跨國華人源自中國大陸，這是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的新現象，他們也是本文的主要關注對象。其主體是所謂的「新移民」群體，大致包括四種類型：留學生移民(在海外受教育後合法地定居當地或移民第三國)，技術移民，通過家庭、婚姻關係的連鎖移民以及非法移民。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中國教育部在2002年初發布的統計，已有38萬中國人留學海外，其中絕大部分是自費留學，他們分布於103個國家，而90%集中於歐、美、澳等國。迄今為止，大約十多萬人已回國，那些仍然居留於海外的約有30萬人，如加上其配偶(其中不少也改變身份，由「陪讀」變為留學生和新移民)，這部分人當有40萬左右^⑦。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留學生人數呈日益上升的趨勢，並日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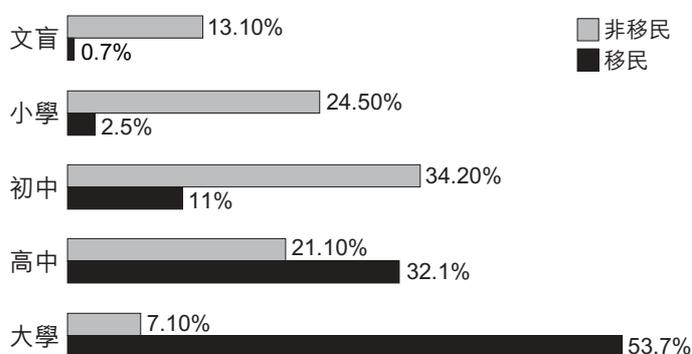
低齡化，這就構成了新移民群體的龐大後備軍。而技術移民也同樣是以西方國家為首選。加拿大在1998年就接受了19,749名大陸移民；2000年，其人數更增至四萬人，佔當年加國新移民的20%。技術移民佔了大陸移民的多數。以上這兩類移民的共同特點是教育程度較高(見表2)。

連鎖移民在中國移民史上並不罕見。早在1930年代，社會學家陳達在閩粵的調查就顯示，70%左右的移民到東南亞是透過家庭關係。據1990年代後半期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的出國審批記錄，當地90%移民是出於親屬團聚與家庭因素移居海外。與前兩類移民來源自中國各地尤其是北方大城市、受過良好教育不同，連鎖移民主要來源於傳統僑鄉(閩、粵、浙)，其教育程度亦較低(見表3)。不過，與前者相似的是，他們也以西方國家為首選。1949-50年間，廣東梅縣地區的95%移民移居東南亞，而在1989-92年間，79%選擇北美和澳洲。

非法移民也是跨國華人的組成部分。這不僅由於其出國(偷渡)途徑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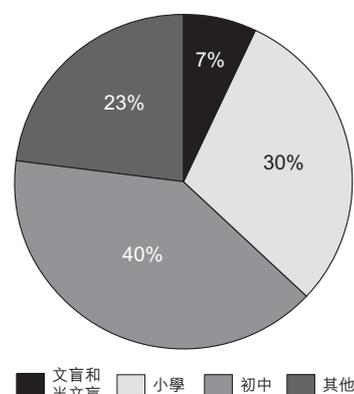
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跨國華人中出現源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群體。其中，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中國教育部在2002年初發布的統計，已有38萬中國人留學海外，他們分布於103個國家，而90%集中於歐、美、澳等國；中國留學生人數呈日益上升的趨勢，並日漸低齡化，這就構成了新移民群體的龐大後備軍。

表2 上海市移民與非移民的教育背景(1990年)



根據以下資料製作：Hua Miao-Ji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A Survey of Emigrants from Shanghai",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no. 3 (1994): 445-63.

表3 浙江勞工與連鎖移民的教育背景(1979-95年)



資料來源：吳潮、周望森：〈浙江籍海外新移民研究初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據中國外交部領事司估計，到1996年為止，有100萬以上的大陸新移民取得外國居留權，而國務院僑辦則估計有200萬左右。一般認為，其總人數應當有150-180萬。1980年之後形成的大規模跨國華人社群，其文化、家庭、生計和活動方式都與傳統的移民(華僑)和定居(華人)有所不同。

常經由數個不同的大陸和國家以及其活動是由跨國人口走私集團所操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與家鄉維持着密切的經濟(通過僑匯)和社會聯繫。以福建省福清市為例，90年代後半期，該市的僑匯收入達2-3億美元之巨，其來源主要是新移民。

關於中國大陸新移民的總人數，各方統計不一。據中國外交部領事司估計，到1996年為止，有100萬以上的大陸新移民取得外國居留權，而國務院僑辦則估計有200萬左右。一般認為，其總人數應當有150-180萬，且在不斷迅速增長之中。例如，以家庭團聚、配偶、未成年子女及父母移民簽證定居澳洲的中國大陸人數，均位列2000-2001年度簽證類別總人數的第二大來源地^⑥。

由上可見，戰後以來，海外華人社會發生了急劇而深刻的變化；不僅出現了由「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歷史性變遷，在1980年之後，也形成了大規模的跨國華人社群，其文化、家庭、生計和活動方式都與傳統的移民(華僑)和定居(華人)有所不同。他們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模式，雖然有人加入這兩種傳統格局，走上回歸或定居的歸宿，但不斷有新人加入跨國華人的行列，因而使之形成一種遊移中的常態。

二 跨國華人的崛起背景

跨國華人的迅速崛起並非一種孤立和獨特的現象；它不僅有着深刻的歷史根源，也是後冷戰時期世界與中國局勢的變化和全球化的產物。

首先，跨國華人的形成是當代全

球化以及伴隨而來的「沒有邊界的世界」的產物。全球化首先是一種經濟現象和世界性的生產分工的結果，亞太區域也隨之日益被納入這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⑦。資訊與交通技術的發達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1990年每英里的航空費用只是1930年的20%；而倫敦至紐約的三分鐘電話費也由1930年的300美元減至1996年的一美元。這些變化使大規模的移民潮成為可能。實際上，當代華人的跨國移民現象只是全球移民的一個縮影。據國際勞工組織在2000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世界移民人數已達1.2億，比1965年的7,500萬增加了近一倍^⑧。

其次，中國國際移民的歷史淵源，尤其是1979年之後改革開放的政策，促進了跨國華人群體的形成。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大批國人從東南沿海地區移民海外，這就構成了當今連鎖移民和部分非法移民所賴以出現的根基之一：以家庭和同鄉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網絡；它同時也有助於這些新移民在移居地獲得經濟上的生存和發展(例如在歐洲的浙江青田新移民，其主要謀生方法是在同鄉所開的餐館和服裝廠工作)。有關歐洲華人移民的研究表明：「移民活動中的一個核心方面是家庭、親屬、同鄉關係在形成、導引、和促進移民流向過程中的作用」^⑨。中國的政策變化也顯著地影響了跨國華人的形成過程。從8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政府就逐漸放鬆對其公民海外旅行和移民的限制，到了2002年初，實施已久的出境審查制度進一步鬆弛；出國申請者不再需要提供海外邀請函以及事先向公安局申請出境卡。對出國留學而言，中國政府也實施「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

由」的政策，並以「為國服務」的口號取代原有的「回國服務」。這一字之差所顯示的變化是巨大的——如果說過去是「愛國不分先後」，現在是「愛國不分內外」。其間效果不僅表明了民族國家界線的模糊化，它也促進了民族國家與跨國華人的良性互動。

連鎖移民和非法移民則更多的是改革後中國社會巨變的產物：高失業率、社會控制的相對鬆弛，以及對西方世界的盲目憧憬，都使得一部分人（尤其是在福建和浙江沿海地區）走上「要致富，去偷渡」的道路。不過，這種行為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理性的冒險投資：其所潛在的回報（直接表徵是那些偷渡者在家鄉所蓋的高樓和其回國時的排場）遠遠大於偷渡者所付出的代價——如果他們能順利抵達目的地的話。《紐約時報》2000年6月25日的一則報導也指出：「偷渡美國更多的是一種有計劃的投資 (calculated investment)，而非絕望的表現。」

第三，移居對象國的政治經濟變化。這對源自東南亞的再移民和中國大陸新移民都有着直接的影響。一方面，戰後以來東南亞新興民族國家對其移民人口（尤其是華人）採取了歧視與限制的政策，這成為再移民的深刻根源；另一方面，二十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開始改變其對亞洲移民的排斥政策：加拿大（1962年）、美國（1965年）、澳洲（1973年）、新西蘭（1978年）都先後取消了過去的限制性條例，使亞洲移民人口迅速增加。2002年3月，德國議會通過一項深具歷史性的法案，客觀上為外來移民打開了方便之門^②。60年代後期，亞洲移民只佔西方國家每年接納的移民總數的1/10弱，到了90年代中期，其比

重迅速增加到40%。日本從二十世紀80年代開始廣招外國留學生，並放鬆對其畢業後在日就職的限制。

西方國家人口與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是一項重要因素：人口老化、低（負）出生增長率、對低層勞工和高技術人才的需求等等。必須強調的是，西方國家需求的並非永久性移民或公民，只是滿足特定需要的勞工或技術人才，但是這些新政策與環境卻為跨國移民創造了機會。另一方面，當代華人移民基本上呈兩極化的局面：具備「可攜帶技能」的高層次人才和低層次的勞工，這恰好能夠填補西方國家的這兩種需求。2001年，美國公司向司法部提呈了34萬份H1-B簽證申請（國內所短缺的技術人才），其

二十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開始改變排斥亞洲移民的政策。60年代後期，亞洲移民只佔西方國家每年接納的移民總數的1/10弱，到了90年代中期，其比重迅速增加到40%。必須強調的是，西方國家需求的並非永久性移民，只是滿足特定需要的勞工或技術人才。



新興跨國華人與傳統華人移民不同的一個特徵，就是其「非地域性」。對於跨國華人而言，民族國家更多的是一種政治主權的象徵，經濟、社會、文化的機會與空間具有更廣的意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領土與地域就是建構於自身活動的空間之中。

中華人佔了第二位，僅次於印度人。由於日本人不願意從事笨重的體力活，他們因而也隨之較容忍外國人（1995年其人數達136萬，佔總人口的1.1%左右）^⑬。

最後，各種類型的中介機構對於跨國華人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就像任何移民活動一樣，僅僅有推力（中國因素）和拉力（外國因素）是不夠的；商業性的中介機構大量出現，使各類型的跨國移民活動成為一種深具規模的潮流。

以留學為例，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留學生大抵包括公派（國家和單位）和自費兩種；後者通常自己聯繫國外學校。但到了90年代之後，隨着留學浪潮的日漸高漲和留學生的低齡化，留學中介機構也應運而生（到2001年為止，全國被正式批准的留學中介機構就有228家）。它們通常收取1.2-1.5萬元人民幣的中介費。雖然費用昂貴，但這類機構，包括諸如「新東方」這種專為「寄託派」（GRE和TOEFL）而辦的學校，仍廣受歡迎^⑭。

非法移民所使用的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中介機構。與前述（多數為合法，以國內為操作基地）不同，這類機構是非法和跨國運作的，捲入者不僅包括人蛇偷渡組織和國際犯罪團體，也包括一些途經國的政府官員。其利潤也是巨大的，每年達數億美元。與此相關的，包括華人新移民在內的跨國犯罪活動也日益引起各國政府的關注。2001年日本警方逮捕或拘留的外籍嫌疑犯達14,660人，其中43.7%為中國人，9.5%為南韓人^⑮。

總之，以上四種因素的交織——國際環境、中國與移民對象國的政治經濟新格局、以及中介機構的作用——

使跨國華人群體（尤其是大陸新移民）得以迅速崛起；這些因素同時也決定了這一群體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特徵。

三 跨國華人的特徵

與傳統「落葉歸根」或「落地生根」的華人移民形態相比，新興的跨國華人群體有其自身的特徵。

首先，跨國華人在形成過程中的「非地域性」（Deterritorialization）。所謂非地域性，原來所指的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生產、消費、政治、群體和認同逐漸與地方分離的一種趨勢^⑯。對於跨國華人而言，地域已不像傳統移民那麼重要和不可或缺；民族國家更多的是一種政治主權的象徵，經濟、社會、文化的機會與空間具有更重要的意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領土與地域就是建構於自身活動的空間之中。這種非地域／領土化本身就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如前所述，到二十世紀末，有1.2億的人口居住在他們的出生國之外。其結果是，「不僅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自己的根，他們也沒有了自己的土地」^⑰。

其次，跨國華人群體的多元性與複雜性。二戰之前，傳統的華人移民群體具有較大的同一性：通常來自華南、承襲中國文化傳統、社會分層上大體以勞工和商人為主；他們通過會館、學校等組織形成了繁密的聯繫網。然而，當代跨國華人群體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兩極化的傾向較為顯著。一方面，由於其特定的教育和工作經驗，留學移民和部分技術移民通常能夠上升到中產階級的地位。1990年美

國人口普查顯示，31%的大陸移民具有本科或以上的學位(全美總平均為21%)；29%的大陸新移民從事專業工作；其家庭收入為34,000美元(全美家庭年平均收入為30,000美元)；另一方面，大陸背景華人家庭的貧困率則為13%(全美平均為10%)^⑩。

這種多元性也反映在跨國華人的社會組織之中，在西方國家，來自東南亞、港台、大陸的新移民都有自己的社會團體，但彼此之間的聯繫十分薄弱(一項1995年的調查顯示，只有10%的日本老一代華人移民認為可以將新移民組織納入其活動範圍內，70%認為很困難。筆者2002年在巴黎中國城所作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留學移民和技術移民的團體通常由通曉雙語者組成，以專業、校友和學術為主要組織原則。而連鎖移民和非法移民通常只會中文，他們較多地參與地緣性的社團。這兩類社團之間缺乏溝通，它們的聯繫模式通常是跨國性的：新移民的專業團體可能同第三國的類似團體有更多的共同語言；而地緣性的團體則更多地通過全球性的社團聯誼活動來建構自身的跨國網絡^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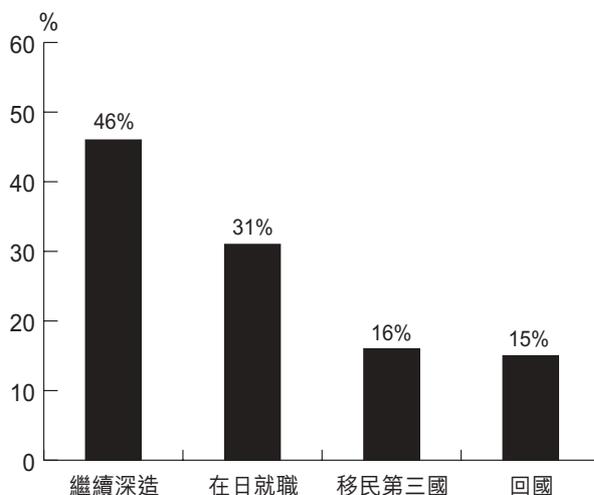
第三，跨國華人活動的多維空間與多元性。傳統的華人移民模式通常是一元或二元的，遊走於由A(祖籍國)→B(移居國)之間。而當代華人跨國活動的最主要特徵之一是其多元性與靈活性。其移居模式可以是A→B→C→D→A這樣一種不斷變化的過程。一項對在日留學生所做的調查大體顯示了這一趨勢(見表4)。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中國留學生與技術移民中有不少「期望轉赴西方國家」。這種多維空間的移民模式隨着交通和資訊的

發達而變得更可接受。用管理學大師德魯克(Peter Drucker)的話來說，我們現在是生活在「新的心智地理」(new mental geography)之中，「距離已經消除」(而在鐵路的時代，人們「只能控制距離」)^⑫。這些新興的跨國華人可以同時「既在這裏也在那裏」(here and there at the same time)；他們可以經常四海為家(home away from home)；或借用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話來說，他們是「旅居中的寓居，寓居中的旅居」(traveling-in-dwelling, dwelling-in-traveling)^⑬。

這種多維空間的格局也深刻地影響了跨國華人(特別是大陸新移民)同中國的關係。近年來，由於一系列因素(如西方經濟衰退、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等)，留學生回國數量日增，出現了所謂的「海歸派」^⑭。不過，我們也要注意這種現象並不會根本改變跨國華人的整體格局。一方面，如同古人所言，「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仍然有源源不斷的中國學生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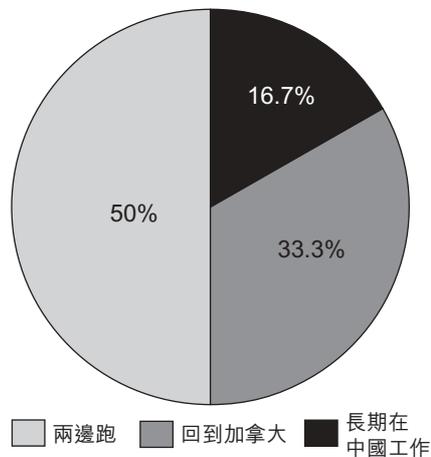
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看，跨國華人是第三文化的建構者。他們既深知母國文化的精髓，也熟悉西方文化的旨趣。這種第三文化雖然與十九世紀末產生於東南亞的土生華人文化同屬「摻雜文化」，但前者更具生命力和創造性，因為它是全球性的氛圍下文化碰撞的產物。

表4 在日留學生的未來計劃(1990年代初)



資料來源：朱慧玲：〈當代中國留日學人及其作用〉，《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表5 在華的加拿大新移民工作地點
選擇 (2000年)



資料來源：〈赴加大陸新移民回流者眾〉，《華聲月報》，2000年第3期。

「跨國華人」不僅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現代化起着推動作用，也是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復興的關鍵載體。這一復興在兩個不同的場景上同時出現：在中國國內，表現為新移民回歸；在國際舞台上，反映在跨國華人積極參與的「反獨促統」、在中美衝突中聲援中國、以及支持北京申奧等等。

入留學的浪潮^⑨，成為跨國華人的後備力量；另一方面，不少回國者仍然與海外保留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並非像過去那樣完全的「落葉歸根」或被迫「斬草除根」。在2001年底中國若干省市政府組織的海外人才招聘團在加國的招聘會上，一位MBA學生表示，她的心態是「兩邊觀望」，看機會何在。如有可能，將先在加國工作，否則就回中國^⑩。一項於2000年對在中國的加拿大新華人移民所做的調查也證明了這種趨勢（見表5）。所謂的「啞鈴模式」（指新移民在海外及中國均有較穩定的工作，經常來往於兩地之間）則是這一現象的具體形態^⑪。

最後，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看，跨國華人既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重要載體，也是第三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建構者。近年來，隨着跨國華人群體的形成與壯大，以其為對象的華文大眾傳播媒介（報刊、電視台、互聯網站等）也日益增多。據初步統計，在美國近百份中文報刊中的1/3、加拿大三十餘份中文報刊中的70%是由大陸新

移民擁有或經營的。一位研究者表示，他在匈牙利所訪問的每個新移民都經常收看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到90年代中期，全美共有635間中文學校，就讀的學生達83,000人，其教師多為新移民。所有的這些中文文化平台都豐富了杜維明教授所稱的「文化中國」的內涵與外延，並建構和維繫了一個沒有邊界的「想像的共同體」。

跨國主義還構成了第三文化基礎，後者產生於那些不停地遊走於兩種（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移民群體^⑫。他們既深知母國文化的精髓，也熟悉西方文化的旨趣，作為跨越地理與文化疆界的群體，他們常常顯得更具創造性。近年來在美國嶄露身手的吳宇森、陳沖、譚盾等，就是明顯例子。出生於印尼、再移民於荷蘭、任教於澳州的華裔學者洪宜安（Ien Ang）寫道：「我的個人經歷促使我既不完全認同『亞洲』，也不全盤接受『西方』。」因此，她的寫作與研究的出發點是「這種摻雜的觀點——含糊不清的既不／也不（neither/nor）或既是這／又是那（both/and）」^⑬。一個在澳洲留學三載並到過香港、東京等地的17歲北京學生表示，她走的地方多了，世界觀也變了，「我現在已經不會在中國和澳洲兩種文化中掙扎。每到一個地方，接觸不同的文化，不是一種排斥心理，而是看有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吸收」^⑭。

這種第三文化並未定型，而是在逐漸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但它成為界定跨國華人的一個重要指標。它雖然與十九世紀末產生於東南亞的土生華人文化同屬「摻雜文化」（hybridity culture），但前者更具生命力和創造性，因為它的基礎是全球性的氛圍下文化碰撞和協調的產物，而非地方性文化交流的結果。

四 結語：理論與方法論的反思

綜上所述，二戰之後，尤其是1980年以來，海外華人社會中出現了跨國華人這一群體，他們處於一種不斷流動的過程之中：一方面，其中一些人逐漸被融入舊有的定居(落地生根)或移居(落葉歸根)模式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斷有新人加入其行列，因而使華人跨國主義(Chinese Transnationalism)成為一種持續變遷中的常態。

本文提出「跨國華人」這一稱呼，並非試圖以它取代現行的「海外華人」或「華僑華人」這些稱謂，而是旨在強調在世紀之交出現的這一新群體，雖然只佔海外華人中的少數，但他們對於整個海外華人社會有着日益重要的影響。跨國華人不僅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現代化起着推動作用，也是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復興的關鍵載體。這一復興在兩個不同的場景上同時出現：在中國國內，表現為新移民(永久的或暫時的)回歸；在國際舞台上，反映在跨國華人積極參與的「反獨促統」、對印尼排華的抗議、在中美衝突中聲援中國、以及支持北京申奧等等²⁹。跨國華人群體的出現使我們必須反思現有的海外華人研究理論範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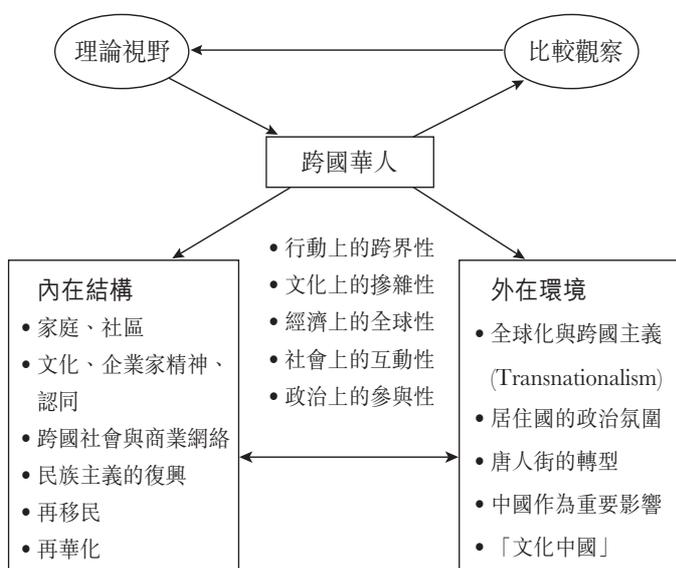
我認為，在闡釋這些現象時，應同時使用跨國的和民族國家的視野。並將之置於歷史的和比較的多重語境下加以考察(見表6)。一方面，新興的華人移民群體及其跨國網絡自覺或不自覺地挑戰民族國家的權威。另一方面，無論是其產生還是作用，民族國家仍然扮演不可忽視的作用(大陸新移民的出現首先是中國政府政策改變的結果)。我們需要「把國家帶回來」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但並不是將國家簡單地視為一種垂直的、僵化的、權威的政治體系，而是更多地看到它如何與橫向構成的跨國華人網絡相協調、互動，並從中壯大自身的力量。近年來中國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優惠新移民、尤其是技術人才的政策(如為其提供一至五年的長期簽證)，「為國服務」口號的提出，一些城市所實施的「綠卡」制度等，可以說是國家對跨國華人的一種妥協，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中國對移民的歧視態度和邊緣化策略。但其結果卻是創造了一種雙贏的局面，它們也使遊走於國家邊緣的跨國移民群體的形成成為可能與必須。

跨國主義的理論能夠使我們從比較的與宏觀的角度審視華人移民，從而避免了「華人(文化)特殊論」這種「自我東方主義」的流弊。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海外移民史的獨特性(如網絡的重要性)，並充分把握這些歷史遺產在全球化的今天所產生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優惠新移民的政策，「為國服務」口號的提出，一些城市所實施的「綠卡」制度等，可以說是國家對跨國華人的一種妥協，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中國對移民的歧視態度和邊緣化策略，也使遊走於國家邊緣的跨國移民群體的形成成為可能與必須。

表6 跨國華人：多重語境下的共生與衝突



總而言之，無論是在理論還是方法論方面，我們應該對海外華人研究中一些現有的框架與概念進行重新思考，在「去民族國家化」，將華人置於跨國語境和空間之後，將其重新引入民族國家及其協調和互動機制之中。這樣我們或許能夠更清楚地把握海外華人社會發展前景，並使海外華人的研究能夠參與到全球性的社會科學對話之中。

註釋

① 有關的海外華人研究理論的淵源與變化，見葉春榮：〈人類學的海外華人研究：兼論一個新的方向〉，《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5輯（1993），頁171-99；周南京：〈海外華人歷史初探〉，載周南京：《風雨同舟——東南亞與華人問題》（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372-83；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no. 2 (1999): 306-37。

② 有關這一時期海外華人歷史的經典性論著，參看王慶武：《東南亞與華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以及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慶武教授論文選》（美國新澤西與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

③ 有關Transnationalism理論的興起、發展與要旨，見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no. 2 (1999): 217-37; Peter Kivisto,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4 (2001): 549-77。

④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如Min Zhou (周敏),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s: Peru, Chicago, Hawaii,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⑤ Chan Kwok Bun, "A Family Affair: Migration, Dispersal, and the Emergent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osmopolitan", *Diaspora* 6, no. 2 (1997): 195-214。

⑥ Thomas Gold, "Go With Your Feelings: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 in *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ed. David Shambaug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5-74。

⑦ 《聯合早報》，2002年2月14日。由於篇幅關係，本文所引的統計資料及調查不能一一註明出處，詳見Liu Hong, "Explaini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Migration (1980-2001): Causes, Pattern,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sian and European Experiences" (Sciences Po, Paris, 12-13 March 2002)。

⑧ www.chinanews.com.cn/2002-03-01/26/165821.htm

⑨ 三好將夫：〈沒有邊界的世界？從殖民主義到跨國主義及民族國家的衰落〉；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全球文化經濟中的斷裂與差異〉，均載陳燕谷、汪暉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6）。

⑩ Peter Stalker, *Workers without Frontiers—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eneva: ILO;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⑪ Frank Pieke, "Introduction: Chinese Migration Compared", i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inese Perspectives*, ed. Frank

Piecke and Hein Mallee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 9.

⑫ *New York Times*, 23 March 2002.

⑬ *Asiaweek*, 9 May 1997.

⑭ 筆者隨意地從「網易」(Netsease)上找到一家留學中介公司(美康投資有限公司)，發現其點擊數達40萬次之多。

⑮ 《每日新聞》，2002年3月29日。

⑯ Michael Kearney,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1995): 547-65.

⑰ 同上，頁557。相關的理論闡述亦可見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302-38.

⑱ Min Zhou and Rebecca Kim, "Formation, Consolid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thnic Elite: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2, no. 2 (2001): 227-47.

⑲ 有關海外華人地緣性團體的國際聚會，詳見Liu Hong, "Old Linkages, New Networks: The Globa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5 (1998): 582-609.

⑳ Peter Drucker, "Beyo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99), 47-57.

㉑ James Clifford, "Traveling Cultur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 L.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A. Treichl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04-108.

㉒ 見《亞洲周刊》，2002年1月14日的封面專題「留學歸國創業潮」。

㉓ 見《亞洲周刊》，2001年8月27日的另一封面專題「第三次浪潮湧向世界」。

㉔ www.chinanews.com.cn. 2001-12-17/26/1471/htm

㉕ 程希：〈人才流失與新移民——七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前往日本和歐洲的留學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㉖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eds.,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她)們是一種文化掮客：「說兩邊的語文，懂兩邊的社會，有兩邊的朋友。他們來來去去，游說兩邊，為兩邊牽線，他們既是這邊的代表，也是那邊的代表。透過他們，這邊了解那邊的文化，那邊知道這邊的習俗。」(見胡晴舫：〈文化掮客的因緣〉，《亞洲周刊》，第52期，2001年12月30日)。他們同樣可以是經貿活動的搭橋人。據一份美國HR的調查，65%的美國公司在華代表原為留美的中國學生。2001年底新加坡政府派赴中國西部的經貿考察團中，特地包括了數名中國大陸新移民。

㉗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viii.

㉘ 〈我不會做「香蕉人」〉，《環球時報》，2002年4月25日。

㉙ 這一複雜的論題需要另文分析。筆者在一篇國際會議論文中對此亦有所討論。見Liu Hong,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inese Nationalism: Crit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ews" (University of Durham, UK, 10-11 April 2002)。

劉宏 歷史學博士，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現為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著作包括《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華僑華人百科全書：學術卷》(副主編)，並發表論文多篇。